

弘扬《讲话》精神 创作文学精品

赵 玫——

一脉相承七十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不久前作家出版社邀请作家手写《讲话》段落,结集手稿成书,这是对《讲话》最富创意的纪念和最为真诚的回首。还记得书写时那种庄严的感觉。

70年前的《讲话》和今天党的文艺方针一脉相承,都是在提倡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发展文艺事业。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文化艺术的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提倡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对社会及大众的影响深刻而普遍。所以把什么样的作品奉献给读者,以怎样的精品力作引导文化进步,就成为每位作家身负的使命。我们只有把大众的思考、情感乃至困惑真实地表现出来,才能和他们心心相印。我们只有把美好的情感和事物传递给读者,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期待明天。我们只有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中坚持文学的操守,才能为读者营造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坚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才能让文学成为推进社会进步、引导文明前进的动力。

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而就是这种多元化的景象,传承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精神,带来了文学今天的繁花似锦。

万镜明——

对于文艺作品标准的新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对待文艺作品要用两个标准去评判,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标准”的提法产生了困惑、质疑甚至否定。我们知道,《讲话》产生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于文艺作品而言,政治性、方向性至关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70年后,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读《讲话》,特别是其中对文艺标准的论述,仍然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我认为今天看所谓“政治标准”,应该将之理解成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看,无论经历了多少朝代变更,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忠孝等优秀品质已经作为民族精神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观;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一个政党的执政主张必须符合并能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一部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受众的检验才能成为精品,时间的延续和受众的层面是无法预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这种核心价值观,它就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使人感觉隔膜或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感,在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能引起共鸣,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应该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艺的“政治标准”,文艺的“政治”属性不是空洞的传播工具,而应该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观念的体现,它也应该是民族的、社会的、大众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黄桂元——

聚时代精魂 促多元发展

重读《讲话》,感受最深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很显然,强调艺术与时代的结合,最终就是要归结为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大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某个特定时代生活的本质呈现和精神映射,有着历史教科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的纪念碑意义,如泰纳所说:“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不应缺席,作家不应失语。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会比想象和虚构更丰富精彩;一方面,文学需要色彩缤纷的表现形式适应一个全新时代。这意味着作家的选材与叙事因此有了更加宽阔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选择。作家不应局限于书斋与想象,走向远比虚构更为复杂、厚重的社会生活,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以海纳百川的超越姿态真正抵达文学现场,为写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完成一种体现时代气质的人文担当。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党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讲话》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对于今天的文艺发展仍有重要指导作用。天津市作家协会近日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研讨会”,来自天津作协、天津社科院、天津师大、南开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与会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研究课题诠释了《讲话》的深远意义,并表示,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继承优秀传统,弘扬《讲话》精神,创作文学精品,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本报摘要刊发与会同志发言。

卢 桢——

《讲话》的现实意义

《讲话》所指明的文学方向,在当下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从整体而言,《讲话》所关注到的文艺创作的诸多角度,依然会被我们在言说今天的文学时予以借鉴和采用。比如,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作家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文艺审美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问题……这些问题放在今日,依然是文学创作和理论评论界必须始终关注的焦点。而这些进入文艺批评的角度,正是由《讲话》所引领出来的,它建立了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角。

《讲话》的人民性的精神内核,一直贯穿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艺思想中,并在各个时期得到“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展。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在第四次全国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在第七次全国代会和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去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会和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把服务群众作为基点和归宿,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立志做人民喜爱的作家艺术家,不断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把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种“以人为本”的创作观,正体现出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肖克凡——

深入生活是必修课

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他的工作是写作,但是同时还要学习。作家深入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方式。从事写作,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比如向社会学习,这本身就要深入生活。所以,我觉得应当强调深入生活的学习特性,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加全面理解深入生活的原本意义,而不是把深入生活当成上级领导的号召,更不能当成政治口号。

作家深入生活,可以获得直接的生活经验和写作资源。但是,深入生活不应怀有急功近利之心,想吃鱼了就拿着渔网去河边逮鱼,不想吃鱼了就把渔网挂在南墙上。这样不好。只有怀着真正的学习之心,你去河边逮鱼才能成为真心学习的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你可能就深入生活了。深入生活的前提是你热爱生活。

向社会生活学习是我们深入生活的方式,那么读书不属于深入生活的范畴呢?一个作家凭借直接生活经验写作,同时也要依靠间接生活经验写作。读书是获得间接生活经验的重要渠道,这也是学习。假若我在阅读《史记》,那么我可能就深入到司马迁所记载的历史生活中去了,这叫不叫深入生活呢?至少这叫历史学习吧。总之,学习往往能够使我们深入其间。我以为,只要是学习行为就基本具有相当程度的深入生活的特征。深入现实生活,也不应当被忽视。

一个写作者的深入生活,应当是广义而不应当是狭义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应当是多样的。我们走向田间地头是深入生活,但是肯定还存在其他深入生活的方式。当然,我主要是想强调作家深入生活的学习性质,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口号。

王之望——

生活：文艺之花的甘泉与沃壤

所谓“生活”,有普泛性和主导性两类。有人否认文艺源于生活,主张“自我表现”,表现“内心”。其实,完全脱离客观生活的“自我”和“内心”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人的“自我”和“内心”也无不由客观生活造就和制约。所以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中外文艺发展史证明,一切优秀作品特别

是那些具有巨大审美认识价值的史诗性作品,都是对彼时彼地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本质要求的真实反映。主张文艺源于生活,并非如有人担忧的那样会束缚作家自由创作的手脚,《讲话》十分强调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文艺家在创作中有选择生活、改造生活和创造生活的自主权,以及在作品中评价生活和表达生活理想的充分自由。

在生活、作品与“头脑”三者关系中,后者皆由前者所决定。但若无“头脑”,客观生活就不可能被反映,文艺作品也就无从创造。“头脑”在创作中,显示为敏锐的生活感受力、丰富而复杂的形象创造力,以及特殊的艺术传达能力。“头脑”的内在机制和特点不同,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反映就不相同,导致作品“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的不同风貌,且其成就有高下优劣的悬殊。文艺家必须不断在充实、更新和改造自己“头脑”上下功夫。

闫立飞——

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根基

文艺精品的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仅是创作的根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起到提升文艺创作水准和内涵的作用。有研究者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作家中存在着“一部书”现象,借此批评他们缺乏创作才能。但是,相对于当前作家的高产和粗制滥造而表现出来的“才能”和“聪明”,“一部书”现象反而显得弥足珍贵。《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大都是作家的“一部书”。当前许多作家并没有因为高产而创作出高品质的作品来。其症结所在就是作家与现实社会的脱离和生活基础的缺乏。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讲话》的科学性。

李治邦——

小说不是编出来的

常听到一些文友谈小说创作,谈来谈去就是一个字,编。就是怎么编得好,编得跟真的一样。我承认小说是编出来的,但编只是一个技巧或者重要因素。编是表层,内涵必须建立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讲话》核心的两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深入生活。其实,为什么人与深入生活是一个主旨,那就是离不开社会,社会的主人公自然是人民。

作家的职责是必须去体验你所描述的生活,与主人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和他们交上朋友。创作就是这样,喜欢谁写谁,写谁会更喜欢谁。

毛泽东同志在70年前所阐叙的为什么人,其实就是给作家建筑的精神家园。社会给作家赋予的创作方式就是为了能给老百姓出好作品,让老百姓从作品里能吸取一种力量,或者对精神的追求有一种思索。怎样将生活的原生态提升为生活的浓缩体,或者说把生活转化成自己创作的素材,丰富,提高,转型,典型等等。这个生活转化作品素材的过程是个艰苦的过程,也是考验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试金石。我们都说什么小作家和作家,我看这就是一道分水岭。

宋安娜——

在深入生活中培养洞察力,焕发激情,锻造创新性

学习《讲话》要与时俱进,不能教条地、机械地对待深入生活,以为走出书斋,下去采访一段,就叫深入生活;或者组织作家出去走访,就一定要出精品力作。文学创作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过程,而且每个作家禀赋不同,差异也很大。我曾在天津保税区挂职两年,深入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生活,新的观念和信息扑面而来,大脑经常处于兴奋之中。但我只用这段生活写了一个短篇。这段生活给我最大的启发,是由此及彼,促使我去思考天津这座城市的开放性格。后来,我用10年时间采访天津犹太人,与现居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交朋友,听他们讲犹太人在天津的故事,感受天津这座城市文化真谛。我先写作了一部长篇纪实《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真实记录了这段生活,现在再以这段生活写作长篇小说。我认

为,要写好一部作品,作家有三个能力不可缺少,那就是:洞察力、激情和创新性。而这三个能力,只能从生活中去找,在深入生活中培养洞察力,焕发激情,锻造创新性。

王 松——

作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番话放到今天仍然适用。所谓人民大众,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精神。我最近到公安部深入生活,接触到2011年“清网行动”中的大量案例。这些人和事都是来自最基层的,因此不仅有生活质感,也带着生活的温度。很多故事只靠作家构思是构思不出来的。

曾有一句老生常谈:“作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作家真正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不能只来自于自己个人的内心感受。我认为,这是《讲话》在今天对文艺工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倾向也须警惕,就是媚俗。应该说,使自己的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媚俗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刘功业——

生活永远是文学的导师

生活永远是文学的导师。作家必须有一个基本素质:就是对生活充满感激之情,对人民抱着满腔之爱,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时刻保持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敏感。我曾到过南昆铁路建设一线、秦岭大隧道、青藏铁路唐古拉山工地深入生活,先后完成了多部从深人生活中得到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这也养成了我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习惯。每当才思贫乏之时,就到生活里去找素材,找灵感,不断有所收获。

文学创作有时候是需要远观、静思。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走到生活中,把文学的情感和脉搏,与时代和大众贴得更近一点,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

好的文学是大众的文学,也是小众的艺术。大众的角度,它需要百姓喜闻乐见,扩大受众;小众的角度,它又需要艺术的反复打磨才能成为精品。大众的艺术智商并不比我们低,他们的知识阅历也并不比我们少,所以,关键还是作家自己要有定力,敬畏文学,尊重读者,也尊重自己,让心中的责任和笔下的功夫都神圣起来。这是《讲话》给我的教育启发。

武 歌——

红色传统是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2010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第一次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走访了11个县市,感受到了陕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浓郁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还有无处不在的“红色历史文化”。让我感到红色传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改变,依旧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陕北红事》,是中国作协2011年的重点扶持项目。这部作品的创作激情,就是来源于在陕北期间所感受到的那些红色往事,还有当下陕北青年对红色传统的发扬和继承。我想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红色人物”告诉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红色传统和红色精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口号,她是一群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一种人生选择,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某种符号。正是这些值得敬仰的人,才铸造了这样一种令人向往的红色精神。

在当下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高扬理想主义、奉献精神旗帜,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秦 岭——

历史观与当下文学突围之一种

我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着眼于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当下的文学日渐被精英化、小众化、圈子化的今天,我们重温《讲话》必须要有历史观,不能拘泥于传统、概念和教

条,应有求真精神、创新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文学脉络,闪烁其中的万千作品,无一不是在历史的大浪淘沙和读者的审美意趣中得到沉淀和升华。我们当下的文学之所以在某种困境中苦苦挣扎,根本原因在于血脉里有太多的渗漏,精神领地过多地被蚕食消解。历史和读者,一个是文学的上帝,另一个也是文学的上帝,避开这个上帝大谈文学的突围,就是空想。

我认为,文学是直立行走的,它巨大的投影往往离不开心灵的呼唤、呐喊、启蒙、批判、共鸣、照应。投影一旦形成,它就属于整个历史和社会。我的观点是对《讲话》的另一种领悟、诠释和解读,有了这并非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并非机械的而是变化的、并非固执的而是灵活的“另一种”,应该有助于当下文学突围。

张 莉——

孙犁的文学财富

孙犁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他跨越了现代与当代文学史,对中国当代创作持续产生影响。他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代表,教科书将“荷花淀派”定位于地方流派,某种程度上限定了我们的理解角度。我认为应该重新理解孙犁的文学财富。

致力于表达“人情美与人性美”,孙犁与“荷花淀派”在“非常态”的战争语境里,书写了人内心的“常态”——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将这样的向往视为人性与人情最朴素和最基本的部分,这是最深层次的孙犁/“荷花淀派”的美学追求与价值。人道主义是他小说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知识分子,孙犁从未将他的写作对象——农村和农民视之为“底层”,他珍视与农民兄弟的情感,在他笔下,农村和农民不是自上而下进行苦难书写的对象,更不是传达个人关怀的抒情道具,农民是和作家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我对孙犁强调小说创作的艺术性印象深刻,他说:“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他是那种宁愿不写,也不愿意违心地写的作家。另外,面对现实题材,孙犁并不拘泥于僵化的现实逻辑而求之于人内心的情感认知,“现实主义”在孙犁和“荷花淀派”那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文学艺术的独到创作,读者通过作品能感受到现实中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孙犁的文学理念并未过时,尤其是在“写实小说”、“底层写作”普遍同质化、概念化的今天。

刘卫东——

《讲话》与“新人”

我正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新人”理论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毛泽东同志一直主张“造就新人”,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工农兵“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那里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历史地看,毛泽东同志这个提法是“新人”理论谱系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从这个角度重读《讲话》,发现号召“写新人”是《讲话》的一条重要线索。毛泽东同志的“写新人”理论萌芽由来已久,他在1937年上海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谈及少年读书经历时就说:“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田种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后来又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说法,我以为是对他心目中“新人”的注释。通常我们总把《讲话》中的“为工农兵”理解为“写工农兵”,当然有道理,但是压抑了“写新人”这个提法。我认为《讲话》并不是要求文艺家只去表现“工农兵”即可(当然题材是一方面),而是要让他们推出具有较高思想层次的“新人”。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意义重大。目前的文学史叙事,如果关注到《讲话》中的这个要求,关注到一个由“新人”作为关键词构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知识谱系,对《讲话》后的“三大批判”、“两个批示”和“样板戏”的理解和分析,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割裂和无序了。

宋曙光——

以大众为服务对象

《讲话》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始终坚持以大众为服务对象,以坚持现实主义为宗旨。从办刊之初,便发表了大量工人作者的作品,首开先河地举办工人作者文学讲习班,由孙犁等副刊编辑讲授文学写作课。副刊编辑还经常深入到车间、地头和军营,这一密切联系读者与作者的组稿方式,传承至今。进入新时期之后,文艺副刊继续以为大众服务、发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赢得读者,并积极组织各种有影响的征文活动,如“关注农民·梁斌文学奖征文”等征稿活动。特别是多年来坚持举办作家深入生活的系列采风活动,讴歌时代精神和先进人物,所刊发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

面向基层和大众,这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健康发展的原则。